

文史资料选辑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办 中国政协文史馆 编

刘宇新 · 参与香港回归过渡期工作的经历

姜恩柱 · 中央驻港工作机构更名的来龙去脉

汪晖 · 回忆唐弢先生

谢雪萍 · 我眼中的张学思

吴仲禧 · 解放战争时期我与吴石的交往

许红星 · 我的祖父许权中将军

陈春森 · 亲历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首刊《晋察冀日报》

文史资料选辑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办 中国政协文史馆 编

(第一七〇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第170辑 / 中国政协文史馆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034-9831-2

I. ①文… II. ①中… III. ①文史资料 - 中国 IV. ①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899 号

责任编辑：王文运

装帧设计：王琳 杨宁建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24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10 千字

印 数：8500 册

版 次：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任：王太华

副主任：刘家强 卞晋平 王国强 方立 龙新民 刘德旺
孙庆聚 闵维方 陈光林 林淑仪 周国富 梁华
谭锦球 翟卫华 陈惠丰 李冰 叶小文 李家祥
委员：万捷 王文章 王兴东 王怀超 韦建桦 左东岭
龙新南 叶培建 冯佐库 吕章申 邬书林 刘春
刘兆佳 李捷 李东东 李忠杰 杨冬权 励小捷
余辉 汪晖 张皎 张廷皓 张研农 张晓林
陈力 陈建功 林野 单霁翔 赵卫 赵长青
南存辉 俞金尧 施荣怀 袁靖 聂震宁 黄书元
黄若虹 黄嘉祥 崔永元 梁晓声 彭开宙 葛晓音
韩康 廖奔 陈爱妃 沈晓昭 刘未鸣 李红梅
丁梅 王重道 韩淑芳 王京平 唐惠秋

编辑部

执行主编：吕瀟瀟

编辑：吕瀟瀟

目 录

香港回归
20周年

- 刘宇新 参与香港回归过渡期工作的经历 / 1
姜恩柱 中央驻港工作机构更名的来龙去脉 / 11
王凤超 我所见证的七份中英外交函件 / 21
李家杰 回归廿年风雨同路 “一国两制”创造历史 / 35

特 稿

- 汪 晖 回忆唐弢先生 / 40

口 述

- 谢雪萍 我眼中的张学思 / 66

人 物

- 吴仲禧 解放战争时期我与吴石的交往 / 75
刘人寿 吴仲禧提供了淮海战役的最早情报 / 86
吴群敢 “奉命”协助父亲参加军情工作的追忆 / 91
许红星 我的祖父许权中将军 / 100
彭援军 新中国外事与旅游活动的“活档案” / 107
——记李玉莺回忆斯大林会见宋庆龄、郭沫若
王春景 在刘居英院长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日子里 / 120

纪 事

- 李广涛 进军合肥，建设合肥 / 139

陈春森	亲历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首刊《晋察冀日报》 /	169
王振乾	亲历国民党六十军长春九台改编 /	172
严俊昌	包产到户第一村 /	185
杂 忆		
董辅仁	中共八大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 /	199
方兆麟	安筱岩与天津周家食堂 /	202
珍 藏	陈叔通、陈铭枢手稿 /	222

香港回归20周年

编者按：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香港文史编辑委员会组织征编、出版了《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 20 周年亲历记》一书。该书聚焦香港回归与发展，多角度、多层面记述和见证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香港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盛况，全面展示了回归 20 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团结带领各界人士，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跨越式增长，人文建设不断进步，社会和谐安定，“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功。本辑从中选出四篇文章，以飨读者。

参与香港回归过渡期工作的经历

刘宇新 *

1984 年，我当选为嘉应商会副会长，并开始参与香港回归的推动工作。从 1985 年到 1997 年这 12 年的过渡时期里，始终为香港平稳顺利回归不懈努力。

* 刘宇新，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

搭建经济与法律的桥梁

1978 年中英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接触，经过反复的谈判，中英代表团团长于 1984 年 9 月 26 日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我作为嘉应商会的副会长，在得到消息后便积极筹备庆祝活动，当月就在香港举办了庆祝 34 周年国庆暨祝贺中英两国政府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大型酒会。

我们推动香港客属工商界 1700 人参加酒会、宴会，在宴会上合唱《歌唱祖国》和《我的祖国》。当时没有人会这些歌，这两首歌是通过新华社在广州找的。整个晚上，两三个小时的晚宴从开始到结束，只唱这两首歌。这是第一个社团以大型庆祝活动的形式欢呼“五百万同胞即将加入十亿人民行列”，没有其他社团敢做这样的事情，活动震动很大。从此开始，曾宪梓和我一起推动香港过渡时期的事情。

随着《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了过渡时期，香港基本法的制定也提上了日程。1985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决定尽量吸取香港市民的意见，因此决定在香港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为此，我创办了《经济与法律》杂志，一方面宣传基本法并广泛征询民意，另一方面介绍中国及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法律发展情况和经验。以这本杂志为平台，搭建起内地与香港在经济与法律方面沟通的桥梁。

1985 年成立了咨委（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我们要积极倡议这件事。创办《经济与法律》这本杂志，主要是为了香港的回归做一个法律的宣传。《文汇报》的高级记者陈应良出来负责做这本杂志，他当社长。我作为创会人，当荣誉社长。做这本杂志早期花了很多钱，很辛苦。这本杂志一般是送给各界人士，还会传到北京去，有关部门领导全都有。

杂志社成立的时候，我们广泛地邀请社会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到《经济与法律》杂志社担任顾问。梁振英是我们的荣誉顾问，很多经济界的大人物，包括李国博、侯德柱、曾宪梓都是我们的顾问；还有台湾的一些人物也拉进来，都进到杂志做顾问。

《经济与法律》杂志社成立5周年，我们在广州举办活动，时任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也来参加。“经济与法律”几个字就是在创刊时由卢瑞华题写的。之后我们在香港每年都会举办《经济与法律》出版的年会活动，邀请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宣传部部长张浚生参加。他每年都来，而且都担当主讲，宣传这件事情。

由于“一国两制”是开创性构思，并无先例可循，而且香港市民对政治理论也比较陌生，因此，咨询委员会秘书处会定期举办讲座，由专家学者讲解。也利用《经济与法律》举办相关的座谈会，请专家来讲解、讨论基本法，配合咨委会的工作。1985、198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好多场讨论，邀请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参加，包括梁振英、萧尉云、王汉斌等都有参加。

推动基本法的宣传和讨论，我们杂志做得比较突出，为什么呢？它宽。一方面，宣传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内的经济资讯，还有中央的法律文件都是通过我们这杂志向外宣扬，向香港宣扬。另一方面讲香港的法律问题，讨论回归的。这个宣传很重要！这本杂志作为“经济与法律”的宣传阵地，当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要认识、理解，还要出钱出力。

以商会为桥梁，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

由于广东邻近香港，改革开放初期便有大量的港澳投资者在粤投资，而由于两地经营方式与法律法规等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常常会产生纷争而

得不到调解。为此，1988 年，我和曾宪梓、杨钊等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广东成立香港广东外商公会。当时是林晓亭提出的，跟我和曾宪梓说，成立这个中间的民间组织去协调，作为广东省工商联的补充，为投资者协调解决纷争。广东外商公会应运而生，为两地投资者服务。

外商公会是在东方宾馆成立的，当时我也在场统筹。统战部和工商联为主体，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当主席。我和曾宪梓、杨钊一起创会，曾宪梓是首席会长，第二是杨钊，我是执行会长。我们前期比较辛苦，要支持他们搞工商活动，联系香港的工商投资者，以及组织港澳投资者来广东参加交易会等经贸活动。香港广东外商公会成立以来，广泛团结在粤投资的港澳实业家，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热心参与慈善事业，为促进粤港澳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获广泛赞誉。

嘉应商会是梅州嘉应各县实业家的商会组织，它的根是炎黄子孙后代，它的魂是爱我中华。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加入嘉应商会成为会员，1984 年被选举为副会长，曾宪梓为会长。成为嘉应商会的“领导班子”成员以来，我便与曾宪梓等十几年风雨同舟，坚决拥护国家政策，始终不渝坚持爱国立场，将嘉应商会打造成为同类社团中爱国爱港爱乡的一面光辉旗帜、香港商界和中央沟通的桥梁。

我在担任嘉应商会正、副会长 10 年期间，十分注意拓展商会的对外关系，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对于商会作用，我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爱国民间社团，有责任为维护香港稳定、促进香港经济繁荣尽力，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架起一道桥梁。当时我真的全力以赴，为香港的过渡回归付出全部努力。

香港回归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 1989 年以后，英方的态度从合作变为对抗，在香港引起了社会动荡。当时的香港股票暴跌，地产萧条，移民潮加剧……整个社会陷入了躁动与恐慌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并没有退缩，反而主动组织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反映当时香港的社

会、经济等情况。

那个时候香港的环境很不好，我们主动跟新华社香港分社讲，鉴于香港目前这样的环境，我们客属工商界人士想组团到北京，汇报香港的社情民意。当时没人敢讲，没人去。新华社也支持我们。1991年嘉应商会组织我们客属工商界到北京拜会国家领导人。这是我组织的，曾宪梓为团长，我为常务副团长，余国春为副团长，团员共50多人。

我们向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港澳办主任鲁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丁关根他们汇报过渡时期参加的这些事，向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客属工商领头，让中央能充分了解香港的社情民意，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

1993年6月的时候，由统战部支持，我又组织了三地的青年到北京去。这个访问团也是我带队，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接见了我们，也是讲香港回归过渡的问题，大家相互交流、介绍。大概是50多个人吧，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中青年企业家一起到北京去。1994年，我作为中华总商会的常务会董，再次到北京访问，江泽民主席接见了我们。这次也是我带队。

铮铮爱国心，“敢说真话不怕被抓”

我出生于1941年，正值日寇入侵、山河沦丧的岁月，因为战争成为孤儿。或许是命运使然，我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我无从知道也无从寻根，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世，我将对父母的爱转化为对祖国、对香港的爱。总之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祖国就是我的母亲，祖国就是我的家，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

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从此香港进入了长达12年的回归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我不断撰文宣传“一国两制”，驳斥不良言论。

1989 年 8 月，香港股市暴跌，地产萧条，社会商品零售额也下降了四成，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莫名的躁动与恐慌之中。我适时发表了题为《困惑的香港人何去何从》的文章，有理有据地批驳一些煽动对“一国两制”恐惧情绪的不良声音。针对“港人弃港”的说法，我直接驳斥道：“这既不明智，也不切实际，大英帝国不可能收留 580 万香港人……正如东江之水源源不断滋润香港一样，内地的改革开放才是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重要条件。”

1992 年 7 月，彭定康来港就任港督，掀起与中国搞对抗的恶浪。我以嘉应商会会长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告诫英国政府“不要迷恋过去欺辱中国的历史”。当彭定康不听中方劝告，一意孤行“量身定做”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时，我又以《擦亮眼睛，选举贤能》为题撰文，让广大港人进一步认清英国霸占香港的丑恶目的，选举爱国爱港人士进入立法架构。彭定康抛出“三违反”的施政报告时，我率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形容施政报告中的未来五年新政是“糖衣毒药、包藏祸心”，猛批“三违反”政策：“当时‘直通车’已经谈好了，彭定康却反对，简直是千古罪人。”

那是香港敏感时期，我写了很多反对港英的文章，可以说是第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那时候觉得被抓了也没什么，反正文章已经发出去了！

成为推选委员，推动特区成立

1996 年为香港的顺利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筹组由 400 名香港永久居民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选委员由三部分组成：筹委会从香港各界别候选者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的有 340 名，自动成为推委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26 名，以及经协商推举出来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34 名。推选委员的只有 34 个，我是其中一个。我成为推选委员会委员后，全力践行推

委的工作，为推选特区第一位行政长官和成立第一届临时立法会作出不懈努力。

选特首之前要做很多工作。对三个候选人，要预先认真了解一下，不能随便推的。有两三场推介活动是我们负责，跟 30 多个推选委员一起。首先收集些题目来问董建华、杨铁梁和吴光正。我来主持，我们逐个请候选人过来问话，讲一下施政理念。大家都认为董建华人格忠厚、稳定；杨铁梁比较硬朗一点，首席大法官嘛；吴光正比较年轻，当时才 40 多岁。我就在那里做了两场的推介会，推荐他们。

我在推委会就是推荐董建华。我推董建华，一个是觉得他年纪大一点，可靠一点，董建华当时 50 多岁了。《经济与法律》顾问当中有不少是我们推委，当时很多人配合我的，杨钊、杨孙西、杨孝华……全都来参加我这个推介会的。

推介完了之后，1996 年的年底选特首。投票的时候，董建华得 320 票，占全部选票的 80%。当时，我在现场投票，钟士元——我们香港的政治猛人，他跟我争。我说：“董建华，你放心，一定超过 80%。”他说：“最多就 70%。”当时有些人看好杨铁梁、吴光正，说香港需要基本法，由执行法律的法官来做比较适合，很多人是这么推测。但结果就跟我预测的一样。

推委会选了特首之后，还要选举临时立法会。我国政府出于中英合作以利于香港政治体制的顺利衔接和平稳过渡的愿望，本来规定，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其议员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直通车”安排。但是，英方不顾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以及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有关协议，一意孤行地推行所谓“政改方案”，毁弃了这一安排。在这种情况下，1994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宣布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随英国对香港管治的结束而终止。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必须有一个立法机构，因此，筹委会决定由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成立一个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临时立法会，作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前的一项临时性安排。

为了成立临时立法会，我也做了很多事，我在幕后安排、推荐，组织推委支持，做了很多事。其中一个是 1994 年成立港进联，我是 25 个发起人之一。港进联成立的时候，杨孙西是主席，副主席是杨钊、刘汉铨、温嘉璇和我，我还当监委副主席。港进联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还有一部分政协委员。我们全力为港进联争取临时立法会的席位，1996 年选举临时立法会的时候，港进联争取到 10 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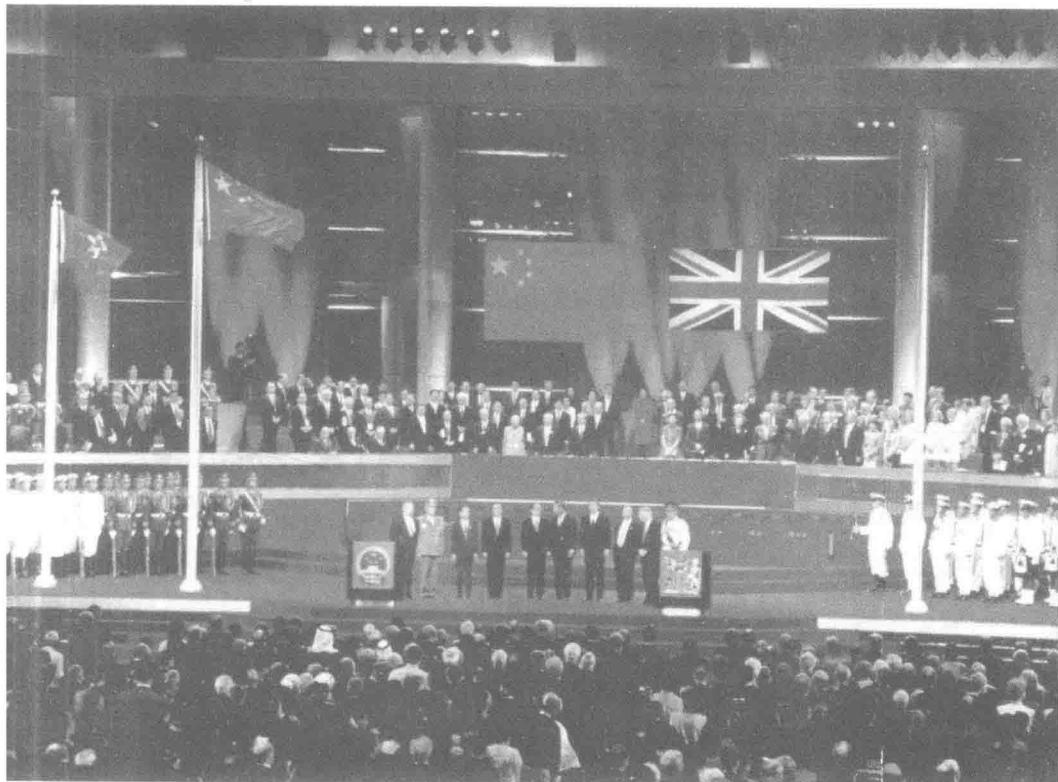
临时立法会的选举，我们是在深圳投票。为什么会在深圳投票呢？由于香港还没有回归，没有“直通车”之后，港英政府不准你搞活动，所以就到深圳投票，用车载到深圳市委、市政府那里，在大楼里选举。

亲历回归，24 小时没合眼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当晚 11 时 30 分才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但 30 日上午 10 时我就已经前往会展中心，因为内心很激动，想早点去等着。我是推选委员，安排的位置离主席台不远。能在现场亲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时刻，我至今仍兴奋不已，现在向孙子孙女讲这段经历都很自豪。

6 月 30 日 23 时 59 分 15 秒，英国国旗和英国统治下的旧香港旗降下，英方护旗手将旗帜摘下、叠起，标志着那段被鸦片和炮火熏黑的历史永远结束。

当时间来到 7 月 1 日零时零分零秒，作为主权象征的五星红旗首次在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升起，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升起，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世界宣告：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顿时，台下掌声雷动，我激动的泪水潸然而出，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一个孤儿，对被英帝强掳的香港有更深的体悟。现在，我看到国家富强，收回香港，这种民族感情太强烈了，12亿中国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此后，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等活动。7月1日上午10时，特区成立庆典举行，已经24小时未合眼的我依然精神奕奕，那时候大家都不觉得困，都激动得不得了。

回归的这个晚上，我一直激动得流泪。香港回归经历了不少波折，真

是不易，那天晚上看到英国米字旗下降，我们的五星红旗升起，心里非常激动，想着大家努力了这么久，香港终于回归祖国了！这一时刻，实现了我几十年的期盼，也凝结了回归过渡期 12 年来的不懈付出。

1997 年 7 月 1 日，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内，亲眼见证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

2015 年 9 月

(何斯华 李梦瑶 吴自力 整理)

中央驻港工作机构更名的来龙去脉

姜恩柱*

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分管欧洲和港澳事务，有幸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的有关具体工作。1997年7月1日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我被派往香港，担任作为中央驻港工作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投身到“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贯彻落实的工作中。

“一国两制”方针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是解决我国收回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贯彻实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一国两制”方针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只能探索前进，它的实践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不断探索、排除一个个干扰、克服重重阻力，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才取得的。

我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至2002年9月在香港工作约五年，那是香港回归祖国后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初始阶段。我和我的同事积极探索作为中央驻港工作机构如何开展工作的路子；全力支持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特区政府依照香港基本法施政；关注特区行政

* 姜恩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